第一章
史料及研究状况

唐末至宋初，南唐政权统治江淮地域近四十年，被认为是当时中原以外的政权中实力最为强盛者。由于传统正统观念的影响，它被置于历史上众多旋起旋灭的偏霸小国之中，未能引起后代史家的足够重视。今天，当我们以新的视角审视这一段历史时，会发现南唐及前身——杨吴政权不仅在当时中国政局中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并且其展示的一部分社会、经济及文化风貌已初露其后中国社会形态的端倪。但由于受“偏据小国”观念的影响，南唐史料的流传受到限制，这为后人研究这一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特殊地位的王朝造成困难。

第一节　有关南唐的史料

1.《旧五代史》,一百五十卷,宋薛居正监修。此书原名《五代史》,分梁、唐、晋、汉、周五书,故又称为《梁唐晋汉周书》。后欧阳修《五代史记》出,称为《新五代史》,薛史则称为《旧五代史》。该书起修于北宋开宝六年（973 年），成于开宝七年(974 年),在现存诸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五代史专著中成书最早，是研究五代史的核心史料之一。金朝章宗于泰和七年（1207 年）下诏：“诏新定学令内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欧阳修所撰。”[①] 此后，《旧五代史》逐渐失传，今本为清代修《四库全书》时，由邵晋涵等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

《旧五代史》中关于南唐及杨吴历史集中于卷一三四《僭伪列传一》中。其作者以中原王朝为正统，对当时中原以外诸政权并不重视，将其中不奉中原为正朔者，如吴国杨氏、南唐李氏、闽国王氏、南汉刘氏等列入《僭伪列传》。另一方面，因当时关于南唐的资料较少，《旧五代史》是据范质《五代通录》而成，而《五代通录》的依据是五代历朝实录，这些材料中涉及中原以外政权的内容也很有限。自杨行密时代起，杨吴及南唐与中原王朝就基本断绝正式来往，中原诸朝对南唐情况记载甚少。薛史成书时，南唐事实上仍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权存在于长江以南，薛居正等无法看到保存于南唐的史料，这使《旧五代史》的南唐及杨吴部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史料上的缺陷。首先，《旧五代史》的南唐部分总体上不完整，只记到中主李璟[②] 为止，而事实上其后李煜的统治还维持了十四年多。其次，它详述了由杨行密至李煌的政权迭变过程、杨吴与南唐对中原王朝的交往交战情况，而对其间的南唐内政、南方政权之间的战争等却未提及，即使是言及南唐与后周之间的战争，内容也偏重于后周一方，而对南唐的有关情况言之甚少。再次，《旧五代史》的南唐及杨吴部分，充斥着大量的祥瑞之说。这些特征说明，《旧五代史》南唐及杨吴部分的史料来源主要是中原王朝档案，而中原王朝对于南方政权的了解则来源于双方的交往。同时，由于南唐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政权之一，并且由杨吴至李氏南唐争夺政权的斗争富有戏剧性，当时产生以此为背景的传说也在情理之中，薛居

① [元]脱脱等：《金史》卷一二《章宗纪》，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282 页。

② 南唐的几位国主多次改名，本书根据不同历史时期采用相对应的名字。

正等很有可能采用了流入中原的这部分材料。

《旧五代史》尽管有片段性与片面性，作为迄今能见到的最早的关于南唐史的撰述，较为全面地勾勒了杨吴及南唐的政治轮廓及其发展过程，其中提到南唐立国时，乃“属中原多事，北土乱离，雄据一方，行余一纪”，其地“东暨衢、婺，南及五岭，西至湖湘，北据长淮，凡三十余州，广袤数千里”，“近代僭窃之地，最为强盛”[①]，概括了南唐立国的前提、统治范围以及在当时诸政权中的地位，反映了同时代人对于南唐的评价。

2.《新五代史》，七十四卷，宋欧阳修撰。是书原名《五代史记》，相对于薛史称《新五代史》。关于杨吴及南唐的部分集中于卷六十一“吴世家”及卷六十二“南唐世家”。此外，卷六十“职方考”、卷七十一“十国世家年谱”都有涉及杨吴及南唐的内容，卷三十二“死节传”及卷三十三“死事传”分别载有南唐人刘仁赡及孙晟事迹。

杨吴及南唐统治者重视国史修撰，其朝廷中设有史官，并记有实录。南唐亡国后，这部分史料被宋朝收集。欧史撰于宋景祐三年（1035 年）至皇祐五年（1053 年）间，欧阳修曾受命修唐史，可以接触到官方收藏的南唐史料。《新五代史》从而较为完整地记录了杨吴及南唐政权的发展历程，并概要介绍了这两个政权的内政。

然而，欧阳修与薛居正一样，都将十国史作为五代史的附属，在这两部五代正史中，十国史仅以列传形式出现。虽然欧阳修接触到的南唐史料已比较丰富，但他仅择其中有关国家大事者，这显然不足以反映南唐的全貌，其书的史料价值也受到了限制。

3.《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宋司马光主编。杨吴与南唐历史集中于卷二五五唐僖宗中和三年（883 年）至卷二九四后周显

①[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一三四《僭伪列传·李景传》，中华书局 1976 年版，第 1786 页。

德六年(959年)之间。司马光著史，意在研究政治得失，故对于可资借鉴的统治之道，即便是出自偏霸小国也予以记载。因此，《资治通鉴》中杨吴、南唐部分的内容、容量与涉及面大大超过两部五代史。除政治史外，作者还将关注点深入经济、文化、社会生活诸方面，对于研究类似的地方政权是很可贵的。

《资治通鉴》在采用正史材料以外，还吸收了杂史、笔记资料。一些史料仅见于《资治通鉴》，如南唐先主李昇对于宦官的抑制等。对于所用资料,《资治通鉴》的作者都详加考证,且原则上不记录符瑞、图谶、占卜、神怪等事。① 在大量原始史料散失的情况下，经过严格考证的《资治通鉴》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特别是《通鉴考异》，列举了诸家史书之不同，并保留了一些已经失传的史书片段，如刘恕的《十国纪年》、徐铉等的《江南录》等,史料价值尤高。可以说,在有关南唐的各种史籍中,《资治通鉴》的考证最为严格,史料价值最高。

《资治通鉴》不仅是史料汇编,更是一部研究性史著,可惜所载内容止于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南唐史另有一大半未能被载人。

4.《续资治通鉴长编》，五百二十卷，宋李焘著。其中卷一至卷十九时间上为宋建隆元年(960年)至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有关于南唐史的后半部分内容，包括南唐中主李璟最后两年的统治，及李煌时代的国政、南唐的亡国以及李煜末年的生活，补足了《资治通鉴》所缺部分。《长编》博采众书,考证严谨,有较高史料价值。

5.《宋史》,四百九十六卷,元脱脱监修。其中卷四七八有《南唐世家》，但其内容没有超出宋人撰述范围。

6.《五代史补》,五卷,宋陶岳著。宋人治五代史,多数将"五代"作为时代概念，而不局限于地域、政权。故其五代史专著在记述中原王朝之余，往往兼及中原以外的政权，这些对于研究南唐史

①见陈高华、陈智超等:《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第205页。

都是有用的。宋代先后出现了一批史著，对两部五代史进行增补、纠误,如王禹偁的《五代史阙文》二卷、吴缜的《五代史纂误》五卷，至今仍被视为研究五代史的重要史料。在这些著作中，《五代史补》较多涉及中原以外政权。

（五代史补》成书于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 年),旨在补薛史之缺。关于杨吴以及南唐史的内容有：卷一之“杨行密钱塘侵掠”、“杨行密诈盲”、“朱瑾得战马”卷二之“淮南写太祖真”、“宋齐丘投姚洞天”卷三之“李昇得江南”卷五之“世宗面谕江南使”、“韩熙载帷箔不修”。作者自称其书“据累朝创业事迹”而成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撰者仍认为其“当薛史既出之后,能网罗散失,裨益缺遗，于史学要不为无助也”②。但所述内容多似传奇志怪，似据当时流行的野史而成，不尽可信。

7.《五国故事》,二卷,作者不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考证应为北宋初年人所作。五代十国终结以后，有人编撰了以南方割据政权为立足点的史著,这些著作大多为私修,《五国故事》是其中保留至今者。其书名称五国，实际上记载了杨吴、南唐、前蜀、后蜀、南汉、闽国六国之事。记事琐碎，类似传闻逸事，但南方诸割据政权所留原始史料较少，本书因其成书年代较早，仍有史料价值。其中南唐部分详记南唐后主李煌宫廷生活，为研究南唐贵族的生活提供了可贵资料。

8.《九国志》,现存十二卷,北宋路振著。路振为真宗时人,曾任知制诰,同修起居注,除《九国志》外,还有《楚书》五卷。《九国志》原记杨吴、南唐、吴越、前蜀、后蜀、楚、闽、南汉、北汉九国之史，其后路振之孙路纶又增人荆南史，实为十国，这是迄今可见的最早

① [宋]陶岳:《五代史补》,台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五一,中华书局 1997 年版,第 717 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十国专史。由于官方史料匮乏，多数关于十国的史著都是依据见闻甚至传闻成书,类似于以时间为线索的杂记,而《九国志》为纪传体史书，体例完备。

五代史特别是十国史，由于历史上长期被忽略，以致原有的一些重要史籍失传,《九国志》即其中之一。此书久无刊本,今本为清人邵晋涵、周梦棠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仍有大半佚失,世家部分仅留下姓名、年号等。现存的十二卷中，卷一至卷三为杨吴史，卷四为南唐史，而南唐史事实上仅剩周本一传。

路振治史态度严谨，其书在迄今所见的五代十国史著中保留杨吴政权史料最多。据《五国故事》、《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宋史·艺文志》以及《十国春秋》记载,杨吴时有信都镐撰《淝上英雄小录》二十卷，其书记录追随杨行密转战江淮开杨吴基业者四十人，这些人来自唐末淮南各阶层，对研究唐末淮南社会应有重要参考价值。此外,杨吴史官曾撰吴太祖(杨行密)等本纪 痫唐代杨吴后，兵部尚书陈濬受命修杨吴史，书未成而卒。此后，南唐史官高远与徐铉、乔匡舜、潘佑共同完成《吴录》二十卷,路振修史,必定参考这些史料。这些史籍已失传，后人研究杨吴历史必须依据《九国志》。由于杨吴与南唐的嬗变关系,《九国志·吴臣传》对研究南唐史也是十分重要的。

9. 《南唐近事》,一卷,宋郑文宝著。南唐亡国之后,其一些旧臣相继著史，构成南唐史料中重要部分，《南唐近事》即其中一部。郑文宝曾任南唐校书郎，直至李煌去世才肯入仕宋朝。他追怀故国，搜集佚闻琐事，作《南唐近事》。此书成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其形式类似笔记,其中提到"异元格,盗物直三缗者,处极法"[①]，是关于南唐法律的宝贵资料。其书为后代治南唐史者所重视，有较高史料价值。

① [宋]郑文宝:《南唐近事》,《丛书集成初编》本。

10. 《江表志》,三卷,为郑文宝的另一部南唐史著作。此书成于北宋大中祥符三年（1010 年）前后，以记朝廷大事为主。分先主、中主、后主三卷,每卷都附有诸朝皇子、将、相、使、臣表,这在现存所有南唐史著中所仅有。可见，作者意在编撰一部内容、体例详备的南唐国史。

南唐有自己的国史修撰机构，史官高远曾撰南唐《先主实录》二十卷及《中主实录》十卷，然而高远临终前感愤于江河日下的国势,将部分手稿付之一炬,宋时仅剩十三卷《南唐烈祖实录》,另有王颜所撰《烈祖开基志》十卷。南唐亡国之后不久,其老臣徐铉、汤悦受宋太宗之命，撰《江南录》，这是历史上惟一的官修南唐史专著。此书已佚，从后人的记述来看，是一部编年体史书，受历史条件所限,成书仓促;“忘远取近,率皆疏略”①。特别是作者作为南唐末年党争中心人物，其政治态度难免有倾向性。当时南唐遗臣对此不满足,另作南唐史以补其不足,《江表志》即其中之一。

《江表志》与《南唐近事》一样,以反映南唐士大夫风貌为主,是南唐史研究中最重要的史料之一，一般认为，郑文宝亲侍李煌，其书中所记应属史实。事实上，郑文宝经历的只是后主时期政事，他对于前朝典故的记载,未必全然可信。《江表志》已缺失大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其“虽存而实佚”②。

11. 《钓矶立谈》,一卷,作者自称“臾 ⿰ 山东无闻人”,从其自叙及书中所记事件来看，应是南唐著名隐士史虚白之子。③ 书中提到:“叟比闻铉其及汤悦奉诏书江南事”,可见其成书时间与《江南录》相近。其“自序”云:“追惟江表自建国以来,烈祖元宗,其所以抚奄斯人,盖有不可忘者,时移事往,将就芜没”,故“随意所商,

① [宋]马令:《南唐书·序》,《四部丛刊》本。

②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六六,第 909 页。

③见《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六六之考证,第 908页。

聊复疏之于纸”,[①] 可见其史料来源与郑文宝二书相近。《钓矶立谈》是一部有强烈政论性的史著，写法上夹叙夹议。在选材上，作者特别注重有关国家盛衰兴亡之事，如南唐对外政策的转变以及党争的经过，并展现了特殊年代中、不同文化背景的各类文人的风貌，这些特点使该书在同类著作中别具一格。

12. 《江南别录》,一卷,作者陈彭年,早年在南唐为官,后入仕宋朝。《江南别录》从杨行密临终记起,分徐温、烈祖、元宗、后主四部分记述，这一体例避免了对杨吴、南唐这两个实则一脉相承的政权的割裂，有其独到之处。其书虽不免仍留有杂记痕迹，然较具连贯性，对政权的演变过程及其间激烈的政治权力之争有较完整的记录。但作者偏好志怪、神异之说，不尽可信。

13. 《江南余载》,二卷,作者不详。从其书自序来看,书成于北宋熙宁八年(1075 年)之后,并以《江表志》为稿本。[②] 其书形式为杂记，许多内容不见于其余同类史著。其中载有一些关于南唐宫廷生活及园林建筑的资料，这在以政治史为主的诸种南唐史著中较为难得。

14. 《江南野史》,十卷,宋人龙袞著。龙袞,《宋史》无传,故其生活及成书年代不详。全书以纪传体写成，形式上已初具两部《南唐书》的规模。其书保存了一些南唐的重要经济、法律资料，如赋税、币制、兵制、刑法诸条，可与其他史书相参照。如其书名所示，书中夹杂许多演义成分，如李昇家世颇具传奇色彩。其书被认为有悖史家传统，历代对其评价不高，但因为南唐史料数量少，此书也常为研究者所用。

15. 《南唐书》,三十卷,宋马令著。马令,《宋史》无传,根据作

① [宋]佚名:《钓矶立谈》,《丛书集成初编》本。南唐先主李昇庙号“烈祖”,中主李璟庙号“元宗”。

②见《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六六之考证，第 909 页。

者自序，其书大约成于宋徽宗崇宁四年（1150 年）前后。马令为阳羡(今江苏宜兴)人,据其自序,作此书的目的一是完成其先祖撰南唐史的遗愿，二是为宣扬尊天子、贬僭伪的思想。因此，马令模仿欧阳修《五代史记》体例,以纪传体成书,对南唐三主本传称‘书’而不称‘本纪’,其余有‘女宪传’一卷、‘宗室传’一卷、‘义养传’一卷、‘列传’四卷、‘儒者传’二卷、‘隐者传’一卷、‘义死传’二卷、‘廉隅传’及‘苛政传’合为一卷、‘诛死传’一卷、‘叛臣传’一卷。另有‘党与传’二卷,记曾在南唐政坛风云一时的宋齐丘等人;‘灭国传’二卷,记一度臣服于南唐的闽、楚二国及其后继政权之事;书末合‘建国谱’及‘世系谱’为一卷,前者为地理志,后者为李氏族谱。

马令在南唐亡国百余年后，博采众书编撰而成，是对前代南唐史资料的总结，然而后代一些学者对此书评价不高。马令在选用史料时缺乏考证，致使其书中芜杂与疏漏并存，作者虽然有意修南唐地理志,但‘建国谱’仅记到州、军为止,较显粗略,这也表明其个人撰史受到资料、能力各方面的很大限制。尽管有这样的缺陷，作为现存最早的一部体例较为完备的南唐史，其书在南唐史研究中仍有突出的史料价值。

16. 《南唐书》,十八卷,南宋陆游著。包括本纪三卷、列传十四卷、‘浮图契丹高丽传’一卷。陆游生活在偏安江南的南宋,收复中原、统一国家是其毕生志愿。在宦游生涯中，他时刻留意山川形势及战守之道，然而一生不得施展政治抱负。陆游为南唐作史，于书中倾注了自己的爱国热情，并展示其政治、军事思想。

《宋史》陆游本传未载陆游作《南唐书》之事,其‘艺文志’在该书之下也未写明《南唐书》的作者,元代戚光为这部《南唐书》作《音释》一卷,经考他书后,认定陆游为其作者,只是私著之故,未于书中具名，可惜戚光所引以为据的书籍已无从考寻。另有学者认为

“刘仁赡之传游固自著其名”①，宋人陈振孙之《直斋书录解题》也记到其书是陆游所作。朱东润《陆游传》认为，该书与陆游参与修撰的宋孝宗、光宗实录一起，构成陆游一生成就的另一重要方面。由于关于陆游的原始史料中不见其书的编著情况，其成书年代不详。

该书著成后流传不广,元代戚光纂辑《金陵志》时“始访得《南唐书》”②,戚光为此书作《音释》一卷,赵世延为其作序,此刊本流传亦不广。清人王士祯称曾见过该书宋刻本。明末，毛晋根据从各处访得的残本将其刊印，即汲古阁本，此后马、陆二书并行。清人周在浚为该书作注,其注本“当时最有名,以未有刊本,故当流传绝少”③。清嘉庆年间，汤运泰又为该书作注。后刘承幹以周注本为基础作补注，以陆书为主，将马书分别入注。

陆书与马书的侧重不尽相同，在史料的选择上也相互有异。清人李清、蒋国祥都编过二书的合刻本，李清本未刊行。历代学者常将二书进行比较。汤运泰总结道“:马书有传是书(陆书)无传者三十九人”④；蒋国祥总结为“马视陆书益四十九篇，陆视马书益二十八篇”⑤。一些列传在陆书中被合于一传之下，另有一些列传在二书中人同名不同，此外还有一些事件的记载有出入。后人为陆书作的题辞总结道：“若申屠令坚之誓死报国，廖居素之立死井中，李邹延之不草降书见杀，段处常之面诮契丹死虏中，赵仁泽之不拜吴越王，张雄之满门死难，乔匡舜之极谏亲征，张义方之力振纪纲，欧阳广之疏劾边镐，高远之料楚难守，陈褒之十世同居，此皆马书

①[清]蒋国祥:《南唐书合刻·序》,清同治甲戌年(1874年)盱南三余书屋刻本，南京大学图书馆藏。

②[元]赵世延:《南唐书·序》,《丛书集成初编》本。

③[清]刘承幹:《南唐书补注·跋》,《嘉业堂丛书》本,南京大学图书馆藏。

④[清]汤运泰:《南唐书注·凡例》,籀绿山房刊本,南京大学图书馆藏。

⑤蒋国祥：《南唐书合刻·序》。

所无’[1]，因此而对陆书更为推崇。学者多认为陆书在思想性及文学性上超过了马书，然而，陆游固守‘南唐’概念，未为由南唐入仕宋朝的徐铉、张洎、汤悦作传，而这三人恰是南唐末年朝臣中最重要的人物，这是陆书缺憾。就史料作用而言，在南唐史研究中，两部南唐书可相互参照。

由于《江南录》、《吴录》、《九国志》等重要史籍的散失，两部《南唐书》史料的具体出处已难考。根据保留至今的这些史书的片段可以看出，马、陆二书都是依据《江南录》为基本线索而成书。例如，关于李昇家世，《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及《资治通鉴》都未明言李昇是李唐皇室后裔，《江南录》与《江表志》、《前后蜀实录》、《吴越备史》都各持己见，而两部《南唐书》承袭的都是《江南录》的观点，即李昇是唐宪宗之子建王恪之后裔，由此可见《江南录》对历史上南唐史研究影响之大。

马、陆二书都是综合前人史书而成，但由于其成书年代距南唐较近，已被当作南唐史研究的基本史料而用。此外，宋人胡恢及由南唐入宋的杨亿也各撰过南唐史，但二书已佚。

17. 笔记、文集。由于南唐史料的不完整，散见于笔记与文集中的资料构成其中相当重要的成分。特别是根据亲闻亲见而录的材料，具有很高价值，其中较重要的有 南唐人刘崇远的《金华子杂编·序》，历南唐与宋两朝的徐铉的《徐骑省文集》，宋人洪迈的《容斋随笔》、释文莹的《玉壶清话》、曾敏行的《独醒杂志》等。

18. 《十国春秋》，一百四十七卷，清康熙时吴任臣著。在元、明、清三代偶有学者治南唐史，明人陈霆作《唐余纪传》，毛先舒作《南唐拾遗记》，但皆为因循传抄之作，价值不高。清代南唐史、十国史研究的最高成就是《十国春秋》。

《十国春秋》卷一至卷十四为杨吴史，卷十五至卷三十四为南

① ［宋］陆游：《南唐书》所附题辞，《丛书集成初编》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唐史，这两部分在全书中所占比例最大。书末有十国纪年、世系、地理、藩镇、百官表，弥补前代史书之不足。此书堪称当时十国史研究之集大成者,清人郎廷极赞《十国春秋》道:"采辑南唐事最为详博，有二书中所未及者，其为列传多至一百九十五篇，证二书所载，仅得吴氏之半，于此服其搜览之广，而古人所传者为简略也。盖吴氏所辑,荟萃众书而成,故其说独详。"①

吴任臣治史严谨，广泛收集资料，其书凡例所列书目达一百五十六种,包括《册府元龟》、《太平御览》、《资治通鉴》、《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及十国史专著、各种地方志、文集等。其中与杨吴及南唐史直接相关的书籍有:《吴录》、《稽神录》、《江淮异人录》、《妖乱志》、《淝上英雄录》、《吴郡志》、两部《南唐书》、《江南别录》、《江南野史》、《南唐近事》、《唐余纪传》、《江表志》、《钓矶立谈》、《史外小录》、《耿先生传》、《南唐拾遗记》。以上基本反映了清初南唐史的史料情况,其中《吴录》、《妖乱志》、《淝上英雄录》、《史外小录》、《耿先生传》未收入《四库全书》,其后流传不详。汤运泰《南唐书注》的凡例说:"李氏三世好文学,当时撰述惟陈彭年《江南别录》,郑文宝《江表志》、《南唐近事》、《江南余载》,龙袞《江南野史》、史氏《钓矶立谈》尚存";而遗文轶事多散见于《资治通鉴》、新旧《五代史》、《五国故事》、《九国志》、《十国纪年》、《五代史补》、《五代史阙文》、《宋史》、《辽史》、《东都事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吴淑《江淮异人录》、徐铉《稽神录》、释文莹《玉壶清话》,以及宋人说部、文集,两江省志、府志中。"② 这个目录反映的是清代后期南唐史料情况，与田居俭先生所著《李煌传》书末所附的体现当代史料情况的书目基本相同。将此书与宋代及其以后的目录学著作相对照，可

① [清]郎廷极:《南唐书合刻·序》，清同治甲戌年(1874年)盱南三余书屋刻本，南京大学图书馆藏。

② 汤运泰:《南唐书注·凡例》。

看出南唐史料的流传情况。

但是，吴任臣未在书中注明其史料的具体出处，这影响了《十国春秋》的史料价值。

1949年以后，南唐墓葬及遗址有多处发现，其中南唐二陵的发掘整理是南唐史研究中的重大突破。

1950年至1951年，在已故南京博物院院长曾昭燏率领下，蒋赞初、张彬、张正祥、宋伯胤等考古工作者发掘整理了位于江苏省江宁县东善镇西北高山的南唐二陵，即李昇钦陵及李璟顺陵，出土了一些珍贵文物，并澄清了南唐史上的一些问题。

两部《南唐书》,都记载南唐先主陵称为永陵,中主继位之后改名为‘ 璟 ”,而复原后的玉哀册显示,先主陵为钦陵,中主继位时名“ 瑶 ”。考古工作者认为“ 钦陵 ’应是李昇陵之原称,南唐向后周称臣后,为避后周太祖郭威父亲‘ 钦陵 ”之讳,才改称‘ 永陵 ”,中主原名是景通,继位后,最初改名为‘ 瑶 ”,其后再改名为‘ 璟 ”。

南唐二陵的柱、枋、斗拱上的彩画，经考证是已知我国建筑物各部分装饰彩画的较早实例。

南唐二陵中出土了一批白瓷与青瓷器，它们的形状、釉色及装饰都表明其瓷器水准介于唐、宋之间，这一发现填补了我国瓷史研究的空白。

南唐二陵出土了190件陶俑，研究者认为这些陶俑代表了南唐宫廷侍从人员，是当时宫廷制度的缩影，并反映了南唐在典章制度上处处刻意仿唐的史实。陶俑的艺术风格也承袭自唐，但缺乏唐代雕塑的生气。

同时，李璟顺陵的规模、陈设都逊色于李昇钦陵，这与李璟轻率用兵、耗尽国力的史实相符。

南唐的相关史籍经历代相传之后，已多掺杂后人的杜撰、附会,难辨真伪,并以反映政治史及帝王、士大夫生活为主,物质文化研究一直是南唐史研究的薄弱环节，而南唐二陵的发掘整理，为研

究这一重要南方政权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特别是《南唐二陵发掘报告》从考古学入手，宏观地把握了南唐文化的特征，指出南唐承唐余风，其实力受到偏据地位制约，难以达到唐代的恢弘气度，但在某些领域内已开北宋风气之先，在中国文化史上有重要的承先启后作用。

第二节　研究状况

对于南唐史的研究，20 世纪以前是以著史的形式出现的。进入 20 世纪以后，学者将近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中国史研究领域，但是南唐史仍未摆脱正史的附属地位，其政治、经济的研究鲜有涉及。另一方面，以南唐后主李煜其人其词为代表的南唐文学却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在文学领域内，南唐史被作为李煜的背景而研究。

50 年代，李煌研究一度成为热点。当时学者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为中心，开展了如何理解李爆及其文学作品的讨论，南唐史在引全国范围内引起兴趣。

进入 80 年代以后，南唐史仍未引起广泛重视。但数十年来，一些学者一直致力于南唐史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

（一）政治史

南唐政治史上较为引人注目的专题是其政权争夺过程及党争。

当代学者任爽先生在这方面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任爽先生先后发表过《南唐党争试探》（《求是学刊》1985 年第 5 期）、《吴唐禅代发微》（《求是学刊》1986 年第 4 期）及《五代分合与南唐历史地位》（《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4 年第 5 期）等论文，其基本论点是：唐代以后，全国经济中心的转移及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构

成南唐政治动荡、变迁的根本原因，来自不同地区的人聚集于南唐，结成不同利益集团，对吴唐禅代起了重要作用，并使南唐朝廷党争不断。然而党争不只是南唐所特有的现象，南唐的政治斗争，有复杂的政治文化背景，仍需学者们进一步研究。

（二）人物

南唐人物中最为后人重视的是先主李昇和后主李煜。一般认为，李昇是五代十国时期最有政治才能的人物之一，他不仅以人臣养子身份成功地夺取政权，并对推动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王永平先生的论文《略论南唐烈祖李昇》（《扬州师范学院学报》1988 年第 2 期）、盛文彬先生的传记性论文《从沙弥到皇帝：李昇是怎样取代吴国的》（《南京史志》1989 年第 1 期）都持这样的观点。诸葛计先生对李昇进行了全面研究，其论文《南唐先主李昇行事述略》（《学术月刊》1983 年第 12 期）综合论述了李昇一生事迹。诸葛计的著作《南唐先主李昇年谱》汇集了迄今能见到的所有有关李昇的材料，对南唐史乃至五代十国史的研究都极为重要。

南唐中主李璟相对而言是个较受忽视的人物，盛文彬的论文《南唐中主李璟》（《南京史志》1983 年第 3 期）介绍了这位南唐在位时间最长的国主的生平。

李煜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的论断影响了 20 世纪人们对李煜的看法。 50 年代的讨论中，有学者将李煜及其词作提高到爱国主义与人民性的高度，另有学者则认为其表现的只是一种境界不高的感伤主义。一千多年以来的人们，特别是文人，出于对李后主词的偏爱，已对李煜形象进行了符合自己理想的改造甚至美化，历史上真实的李煜有别于作为文学形象的李煜，这一场讨论有助于人们更客观地认识李煜，只是它未能对后来的研究产生有效的影响。

从史学角度来看，夏承焘先生所著《唐宋词人年谱》中的《南唐二主年谱》汇集了丰富的史料，成就很高。田居俭先生以文学笔法

作《李后主新传》,广采史料,是较全面的李煌传记,在此基础上,田居俭又著《李煌传》内容又有增补。这两部著作，虽以文学作品形式出现，就其内容而言，亦是严谨的史学著作，为当代文史结合的典范之一，受到学界好评。

（三）文化

南唐在短短数十年、有限的地域内,在文学、绘画、书法等众多领域内为中华民族文化史创造了一批不朽之作。经过千年历史的磨砺，这些艺术精品更显出其恒久的生命力，人们对南唐卓越的文化现象格外重视。陈高华先生的专著《宋辽金画家史料》辑录了多位源于南唐的画家史料。

学者们普遍认为经济发达、社会安定与统治阶级的大力推广是南唐文化繁荣的背景。但是，南唐文化的研究多停留于表面的个别现象研究，对于其渊源、发展及在整个文化史中的地位的探讨还缺乏。魏良弢先生著《南唐士人》(《江苏社会科学》 1995 年第 2 期），从研究南唐不同类型的文人入手，探讨了南唐文化的深层内涵。

（四）哲学、宗教

南唐佛、道盛行，特别是后主末期，礼佛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大事，但南唐在宗教史上的地位仍是研究领域内的空白。

出身于南唐的谭峭所著《化书》,以道家思想为基础,近年来引起部分研究者注意。研究论文有卢冀宁先生的《论谭峭（化书）》(《江海学刊》 1983 年第 1 期）及高令印、陈其芳先生合著的《谭峭在唐宋哲学发展中的地位》(《福建论坛》) 1984 年第 4 期)。研究者认为，《化书》反映了五代十国人民的痛苦生活，具有进步意义，在宗教哲学史上应有一定地位。

（五）经济、法律

南唐的经济、法律状况由于资料所限，研究较少。事实上，南唐辖地经济发展水平、新出现的经济制度及在唐宋之间的传承地

位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杨吴以及南唐先后有《吴令》、《昇元格》、《昇元删定条》等法令，这些法律制度在社会由战乱向和平的转变中，也有变化的过程，然而都未得到足够重视。

综上所述,南唐(杨吴)历史研究,对于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对于唐宋之间社会转型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南唐史研究的各个领域内都存在着空白，有待研究者填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